

聚焦中国经济

内容提要：

中国历史上历次社会大变迁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农村贫困有关。千百年来，贫困就像幽灵一般，时而隐于沉寂，时而显于骤变。在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 20 多个朝代中，曾爆发生过上百次农民起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个朝代建立之初大多有“均贫富，分田地”之类的“德政”。

目 录

一、蓦然回首：从缓贫到脱贫

| | |
|--------------------------|----|
| 1、缓贫历程..... | 1 |
| (1) 贫困与社会稳定 | 1 |
| (2) "剪刀差" 与 "以粮为纲" | 7 |
| (3) 高相关性 | 13 |
| 2、变革前后 | 16 |
| (1) 农民的理性选择 | 16 |
| (2) 区位优势转换 | 20 |
| (3) 走向繁荣 | 25 |
| 3、扶贫管理 | 27 |
| (1) 脱贫进程 | 27 |
| (2) 扶贫效益 | 32 |
| (3) 市场潜力 | 39 |

二、重归同富路：经济均衡发展选择

| | |
|------------------|----|
| 1、思路重构 | 49 |
| (1) 里程碑 | 49 |
| (2) 联合产权制 | 54 |
| (3) "无为而治" | 57 |
| 2、市场缺陷 | 60 |

| | |
|----------------------|-----|
| (1)缘木求鱼 | 60 |
| (2)市场外力 | 63 |
| (3)政府干预 | 69 |
| 3、转移 | 74 |
| (1)收入转移与社会福利政策 | 74 |
| (2)扶贫资源传递系统 | 81 |
| (3)瞄准贫困人口 | 88 |
| 4、调整 | 94 |
| (1)山区小康与县域经济 | 94 |
| (2)与发达经济接轨 | 103 |
| (3)倾斜 | 110 |

三、谁主沉浮：经济均衡发展自然环境

| | |
|---------------------|-----|
| 1、环境文明滑坡..... | 115 |
| (1)"生物圈2号"的贫困 | 115 |
| (2)环境贫困化 | 120 |
| (3)水资源贫困 | 124 |
| 2. 生态文明失衡..... | 133 |
| (1)臭氧稀缺与酸雨泛滥 | 133 |
| (2)森林沙化与水土流失 | 138 |
| (3)化学品的危害 | 141 |
| (4)开发的贫困 | 144 |
| 3、南北水旱..... | 149 |
| (1)上帝的笔误 | 149 |
| (2)水灾 | 154 |
| (3)后果 | 157 |
| 4、天灾人祸..... | 162 |

| | |
|------------------------|-----|
| (1)人祸 | 162 |
| (2)旱灾 | 165 |
| (3)人愿 | 169 |
| 5、富饶的贫困..... | 172 |
| (1)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 172 |
| (2)实现生态经济均衡 | 180 |

一、蓦然回首：从缓贫到脱贫

1、缓贫历程

(1) 贫困与社会稳定

中国历史上历次社会大变迁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农村贫困有关。千百年来,贫困就像幽灵一般,时而隐于沉寂,时而显于骤变。在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 20 多个朝代中,曾爆发生过上百次农民起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个朝代建立之初大多有"均贫富,分田地"之类的"德政"。几乎可说,在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动荡的背后,都隐藏更为深刻的经济原因——即为摆脱难以为继的贫困生活,中国农民一次又一次挺起自己的脊梁,向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和合理的收益分配方式宣战。"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公元前 207 年 7 月,陈胜、吴广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起义轰然爆发了。

"吾疾贫富不均。"北宋建立后才 33 年,濒于饥饿破产境地的农民在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为反对土地高度集中的封建制度,中国农民第一次把"均贫富"三个大字明确地写在自己的战旗上。

明末崇祯即位前,陕西连年灾荒,"野无青草,十室九室",人民无法生活。"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已是众望所归,于是一场始于汉中,由李自成领导的、历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然而,不幸的是,为摆脱贫困、争取生存权利的广大贫苦农民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却是封建秩序的恢复。随着新的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农民的强烈呼声一次又一次被淡化了,贫困依然笼罩着中国广大农村。自然,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又一次动乱的恶性循环之中。历史一再告诫人们,忽视农村的贫困,将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聚焦中国经济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潮流,以反映农民切身利益的土改制度变革为先导,首先紧紧抓住了农民这支革命生力军。"打土豪,分田地",这富有感召力和战斗性的六个大字把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真正地表达出来,农民的社会公平意识被唤醒了,农民对人身自由的企盼似乎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就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怀着这种朴素理想的一支革命力量,从广大农村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号角,从而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50年代前半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

贫穷而勤劳的农民似乎实现了梦想,终于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并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出现了空前的高涨,苦心经营与辛勤劳作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同样,农业增长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增长表明了农民对新经济机会的反应:尊重农民,通过普遍增加生产而追求个人财富;尊重农民对生产方式的自愿选择,只要国家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向贫困告别似乎成为中国农民不太遥远的目标。

伟大的胜利激励人们实现更伟大的目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性胜利激励着人们去超越历史。历史悲剧终于发生。在胜利面前,人们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实行土地政策和物质利益原则政策的胜利误认为是主观意志的胜利,因而滋长了一种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左"的观念,不顾条件地追求"超级过渡",用强制手段实行人民公社型的集体化,企图通过"穷过渡"的捷径跨入"共产主义"。一时之间,人民公社化的浪潮无情席卷了全国。农民不仅被剥夺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且连耕作经营的自主权也丧失

聚焦中国经济

殆尽,"大锅饭""一平二调"取代了"物质利益分配原则",农民的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挫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20多年来农民仿佛做了一场恶梦,贫困的阴影始终笼罩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

回顾历史的不幸是痛苦的。从1957~1977年,一组组冰冷的数字令人心寒,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农村普遍出现大饥荒。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千万计。

1976~1977年的统计显示,中国约有200多个县仍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1977年,全国80%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不足100元,其中有1/3在50元以下。

197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其中农业尤为突出: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仅134元,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辛苦劳作一整天,工分值也不过0.30元左右,有的贫困地区竟在0.22~0.08元之间,也就是说,劳累一天的价值与一盒火柴的价格差不多。骇人听闻的贫困和低效劳动长期以来被表面的政治热浪所淹没。1978年与1956年相比,中国农民每年消费的大米、小麦等主食的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牛羊肉的年消费水平下降近1倍,年人均消费量仅为0.58公斤。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低收入的贫困农村人口竟占共和国人口总数的80%。

70年代末,当中国农民从恶梦中醒来时,他们发现:幻想破灭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永无休止的政治说教,马拉松接

聚焦中国经济

力式的运动,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实惠,反而使他们陷入生活的困境。

农业经济的长期停滞,积重难返的农业问题,已成为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1979年,中国政府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作出两大决策:一是从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工业发展基金中切出一块,用于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的农产品一次性提价高达15~35%;二是准备大规模长期地进口粮食。仅1980年从美国进口粮食就花费约20亿美元。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刺激,粮食需求环境相对宽松而带来的农业政策的松动,以及政治上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呼声,为一场默默的、自下而上的伟大变革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以摆脱贫困的强烈渴望和冲动为动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先在那些“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山区、灾区、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自发地展开。当安徽、四川、贵州等地的农民悄悄地向传统的公社型管理体制挑战时,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恶劣处境使人们来不及做太多的联想和政治判断,国家经济上的乏力,政治上的松动为农村改革闪开了一个空档,以户承包的经营方式一出现,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产生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经济活力和社会共鸣。到1985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蔓延到全国,成为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冲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农民天然的劳动权利和合法收益获得承认,长期受到抑制的农民内在冲动获得释放,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同时,长期以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掩盖的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危机也暴露出来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何处去?从拥有土地经营支配权中获得对自身劳动自由支配

聚焦中国经济

的中国农民,依靠自己开始了艰苦的自立选择。在利益比较的驱使下,乡镇企业成为中国农村第二个经济成长点。

短短数年间,中国农民不但使诸多的农业产量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而且还在不要国家投资的前提下,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的历史性转移。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了33%;棉花增长了189%;以农业产值衡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率增长113%;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140%。而在这一系列增长的背后,是同期国家农业投资的减少,国家整个“六五”计划期间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按绝对值计算比“五五”计划期间减少了33%。农村改革不仅使中国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工业化建设,而且使中国长期的农村贫困状况得以缓解。根据中国官方首次公布的70年代农村贫困情况,尽管以人均年收入50元作为绝对贫困线是一个过低的标准,但是在1977年仍有22.5%的县人均分配收入低于50元;1977~1979年人均集体分配收入连续3年低于50元的持续贫困县为221个,占总县数的9.6%;连续3年人均分配收入低于50元的持续贫困人口达8787万人,占1978年农村人口的10.8%。但是,到1985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达到397.6元,不足200元的低收入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2.2%,约1.02亿人,其中人均收入不足150元的有4000万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4.4%。

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政策效应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大多数地区,贫困已成为历史。短短的十几年里,中国农村的缓贫和脱贫速度令世界瞩目震惊。然而,兴奋之余,一些新的现象也不得不令我们忧心忡忡。中国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300万平

聚焦中国经济

方公里海洋国土,12 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其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是一场严峻的挑战。自 8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分布日益表现出区域性的特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区域性倾斜,各地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1985 年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在视察江西省后指出,他们去过的老区收入在 120 元以下的贫困户约占 1/3 左右。这些贫困户缺粮、缺油、缺衣被、缺钱、缺医少药、缺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都有较大困难。在一次全省老区工作会议上,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不无沉痛他说:解放 30 多年了,在埋着 25 万有名有姓的烈士忠骨的老区土地上,还存在着缺衣少粮的贫困户占总户数 1/3 的这种贫穷状况,每个干部都不应对此无动于衷。老区的状况如何,不仅在我省,而且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

目前扶贫开发总的形势是:东部地区贫困状况明显改善,中部地区有所缓解,西部地区依然严重;平原区、丘陵区、浅山区扶贫开发工作进展快、效果好;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库区、地方病高发区任务重、难度大,即使在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地区,基本生产条件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返贫率高。标准低,差别大,不稳定,是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世界银行对中国缓解农村贫困能力的预测表明,如果 90 年代中国的经济能保持 6.8% 的年增长率,经济内部的改革继续进行,收入分配合理,到 2000 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下降到 3500 万。但是,如果 90 年代中国农业贸易条件恶化,或者

聚焦中国经济

落后地区无法参与增长进程等,都将危及中国的全面发展,尤其危及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若加上外部条件不利,而内部改革又不能实现,90年代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则不可能超过5%,这将导致2000年时,中国仍将有5000万贫困人口。如果相对价格变化造成的收入转移等因素引起农村穷人实际收入水平下降,2000年中国返贫人口将突破1亿。

无论是中国农村的现状,还是对中国未来缓解贫困的能力和速度的预测都充分证明,中国的前景不容乐观,消除中国农村贫困不但是一项长期的、艰苦复杂的历史任务,也是涉及国家和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任务。它需要以科学完备的政策体系为先导,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不言而喻,贫困与发展将构成中国下世纪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2)"剪刀差"与"以粮为纲"

农村改革开始后,有关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了对中国各地2162个生产队进行抽样经济调查的结果。调查反映,从1965年到1976年的11年间,这部分生产队的6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亩产量由116公斤提高到158公斤,增长35%;而同期每亩粮食成本由26.2元提高到40.5元,增长54%;每个劳动日值由0.70元减少到0.56元,下降20%。1978年,江苏某县粮食亩产量超过650公斤,而每增长0.5公斤粮食,却要亏损1分钱。山丘圩湾俱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安徽六安地区,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9亿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22亿公斤,单产由84公斤提高到200公斤,年平均递增3%左右。农民人均收入直到1979年仍只有25元,收入在60元以下的穷队占48.30%,有47.60%的农户年终超支拖欠。而耐人寻味的是,改革前在全国出现的一大

聚焦中国经济

批高产穷队中,它们多数都是先进社队,锦旗奖状令队部办公室"四壁增辉"。但是,获取这些荣誉都是以农民连年增产,收入连续下降为代价的。这就是典型的先进地区的贫穷。

这种由先进致贫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等价交换政策所致。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1215.86亿元,共达10932.61亿元,扣除同期国家财政各项支农(含对农村的社会救济)资金3792.56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量达7140.05亿元,即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5左右被国家拿走了。仅按此计算,国家对农业取与给之比为3:1。

世界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农业余量规模对工业化推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贝罗赫估计,西方国家在产业革命前的40~60年中,农业生产率增长40%左右。表明国家工业的起飞,必须要以农业的长期积累作为启动资本。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的任务是迅速实现工业化。当时国际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使中国不可能从外部取得工业启动所需的资金和物质条件,从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就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积累的基本形式。

长期以来,尽管比值剪刀差绝对额时大时小、但作为一种积累机制,始终以低于社会价值水平的低价格保持着农产品的供给,保证了整个社会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大致平均,同时又为工业化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这使得中国一举跳过了低收入国家发展初期共同面临的"低水平增长陷阱",因此,这种形式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当"剪刀差"成功地发动现代增长之后,如果仍然以这种行政方式作为持续积累的机制,其种种弊端就显示出

聚焦中国经济

来。首先,50年代初期,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较低,存在着国家向农民征过头粮的倾向,国家在征购粮食时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一些农民变相拒绝卖粮,各地曾出现竞相提价购买粮食的现象,黑市交易也一度出现,加大国家征粮工作的成本。从这层意义上讲,农业合作化之所以由初级社、高级社迅速推进到人民公社的极端形式,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事实上,正是这种体制提供了国家控制农业产出和农村基层经济单位的手段,从而为"剪刀差"的运行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与此同时,问题的另一方面却被忽视,即这种体制的形式是以牺牲农业效率为代价的。其次,国家规定的农产品价格实际上阉割了价格的市场功能,农产品价格既不能反映农产品的稀缺,又不能刺激农产品的供给。第三,为保证"剪刀差"顺利运行,避免市场价格的冲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国家把主要农副产品集贸市场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取缔。"剪刀差"不仅以牺牲农民的整体利益来换取工业部门的增长,同时在农业内部也牺牲农民商品意识和个人发展机会,窒息农业经济活力。这就是中国农村无论是落后地区还是先进地区都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

70年代末,当中国农村长期普遍贫困,维系"剪刀差"运行的、以非物质刺激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难以维持和提供有效的供给时,中国工业发展受到极大制约。为了保证稳定的积累来源,消除农业长期停滞为工业增长造成的主要障碍,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大幅度提高主要农产品价格和大规模从国外进口粮食,以便给中国农村以休养生息的喘气机会。80年代,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并非中国领导决策层的主观意志所为,而是由于深刻的经济原

聚焦中国经济

因所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演变成一种客观的必然选择,是因为国家既拿不出更多的资金,也提不出更好的方案来打破农业领域长期的沉闷,以有效地解决工业积累和改变农村长期贫困的局面。然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粮食和积累,而在于农民挣脱了传统体制束缚的桎梏,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权利,并同土地实现了直接结合。农民的自我意识终于有了经济依托。

在“剪刀差”的利益反差比较下,城乡隔离的制度屏障被打破,成千上万从承包制带来的效率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涌入非农产业,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国家工业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和农民为主体的工业化并举的双重工业格局。1980~1988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46倍,其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1.3%;1978~1988年,乡镇企业向国家交纳税金增加13.2倍,平均每年递增31.4%,远远高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8.3%的增长速度;在1978~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中,乡镇企业占21.63%,其中1985~1988年间高达50.87%;从1978~1988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545元,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3.7%;从1978~1988年,乡镇企业共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6700多万人,平均每年以吸收672万人的速度增长。到1988年,乡镇企业就业劳动力已达9545.4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3%;乡镇企业每年还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以工补农”和乡镇建设,发展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和教育事业,1978~1988年这10年间,仅乡镇企业用于支援农业发展的资金就达162.8亿元。农村工业化的伟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为中

聚焦中国经济

国工业化提供了第二条道路,在于中国农民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了中国工业增长的进程,并与城市共同分享现代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两大创举,它是对行政性"剪刀差"以及维系其运行体制的反对和抗争,中国农村从整体水平上由贫困迅速实现温饱概源于此。

农村产业政策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以粮为纲"的单一产业政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林牧副渔各业不同程度的萎缩。1978年中国林牧副渔各业产值合计占农业总产值的32.2%,各业实现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则更小。这就不能不使中国近1/3的社队不得不靠贷款维持简单再生产,3亿农民不得不靠吃返销粮、花救济款维持生计。片面推行"以粮为纲"的产业政策使中国付出的另一重大代价是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极大破坏。在平原地区,农业生产结构转型比较容易,种植粮食或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经济效益问题,因而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远不及山区严重。中国山区面积达64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7.6%(不包括海洋国土)。由于强行要求把一切土地资源用于粮食生产,于是,山区大规模出现了在陡坡上毁林、毁草开荒、围湖造田、滥用水资源的荒唐行为。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是,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罕见的水灾、旱灾相继发生,以致于资源日少,土层日薄,地力日衰。山区一些当年的"大寨县"至今难以脱贫,这与当时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给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破坏所带来的恶果不无关系。

经济学原理认为,只要资源和生产条件存在差异,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在一个区域内实行自给自足,都将不可避免地

聚焦中国经济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条件的高相关性,农业资源配置的最佳原则应是采取地域分工、专业化协作的方式,通过市场交换达到各区域优势互补,从而使社会总财富增加,80年代中国农村产业政策的改变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以鲁西北为代表的华北黄河下游的农业区,是棉花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而闽东南沿海农业区有史以来就是中国甘蔗的主要产区,依靠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的土地上维系了稠密的人口的生存。但是,从6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自给政策的推行使这两大经济作物比较优势极为显著的农业区迅速由比较繁荣走向贫困。到70年代末,鲁西北已成为中国贫困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冀、鲁、豫、皖接壤的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贫困区。闽东沿海的持续贫困人口达450万,居全国贫困区第四位,80年代,随着粮食自给政策的逐步放松,这两大贫困区便迅速实现温饱,开始摆脱贫困。

在中国山区,由于粮食自给不借以牺牲畜牧业和经济作物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严重下降。中国山区类型复杂多样,分布极不平衡。在一些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较轻的山区,自然资源再生能力恢复较快,农民转种传统经济作物相对容易,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广西昭平县走马乡,90%是山区,历史上畅销东南亚的"勤江茶油"主要产于此地。50年代茶油最高年产量32万公斤,农民的粮食供应历来依靠"区际交换",以油换粮。但在60年代,为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这个乡(当时叫公社)只得集中劳动力在人均0.4亩的山间冷水田搞"以粮为纲",致使1.2万亩

聚焦中国经济

茶油荒芜,70年代产茶油1万公斤,成为一个穷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在周围地区粮食大增产的基础上,走马乡逐渐恢复"以油换粮"。全乡已经用经营油茶的收入,按超购加价的价格水平购粮。有十几户农民已靠换粮完成本户的承包粮食征购任务。这一交换充分发挥了不同地区的自然优势和技术专长,保持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同时又大大刺激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增长,为国家和农民提供了更多财富。在80年代的中国山区,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以甘肃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河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简称"三西地区")在80年代以前,是生态破坏严重,资源贫乏,人口超载而闻名的贫困地区。80年代初该地区被列入中国政府第一个反贫困计划的区域,开连片治理、开发扶贫先河,其做法和经验对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三西地区"扶贫作了专栏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其中首要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从改善整个区域的生态和生产条件入手,退耕还牧、退耕还林,寓缓解贫困于国土资源的保护与整治之中。然而,"以粮为纲"在中国山区对生态资源的破坏而给农民留下的隐患远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国家财力有限,还不可能一挥而就解决中国山区的环境生态问题。在黄土高原的贫困地区中,"三西地区"无疑十分幸运。

(3)高相关性

米有录等根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司统计,对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乡镇企业分区分析,结果令人吃惊。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8个省市的乡镇企业总收入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收入的60%,